

Qi Dai Yu zhui Luo

期待与坠落

——秦汉文人心态史

Qin Han Wen Ren Xin Tai Shi

方 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由于由秦到汉亡，時間跨度大，地域遼闊，以及人文背景，個人經歷方面的差异，同一時代的不同人，

其心態肯定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個人，

他的心態也是無限豐富，發展變化的。

我們只能把握秦漢這四百余年文人心態的大致脈絡，

而不能曲盡每一位文人復雜的心態，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由秦而漢，文人心態的豐富多樣，是這個時代豐富性的體現。

秦漢文人忽遇劇變，由戰國文人在學術及言論上的無限自由到秦的空前專制，

其適應力一時難以轉變，必然導致暴秦的殘酷鎮壓。

終漢之世，無論是君主還是文人，

都試圖恢復秦以前重視文人的自由傳統的價值觀，

並自由地按照孔子所建構的大同及小康標準建設和評價社會進步的成果。



由于孔子的主張更多帶有理想化特征，在大同及小康時代，也未必如兩漢那般精彩，

因此，兩漢的社會和兩漢的文人，

都可以說具有理想化色彩。

所以說，兩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自覺地實踐孔子理想的時代，

兩漢的文人也是最追求聖人人格的文人。

這樣的特點，理應為漢以后的任何一個時代所仰慕。



期待与坠落

——秦汉文人心态史

方 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方铭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

(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陈桐生,刘怀荣主编)

ISBN 7-5434-4158-6

I.期… II.方… III.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87 号

书 名 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

作 者 方 铭

责任编辑 郝建国

封面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158-6/D·25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 1 }
第一章 威武不屈与复古心态的萌动：秦朝文人心态	{ 5 }
一 秦的统一及覆亡	{ 5 }
二 秦博士的复古心态	{ 17 }
三 焚书坑儒与李斯其人	{ 28 }
第二章 渴望统一与经世致用：楚汉战争及汉初文人心态	{ 39 }
一 积怨而发愤	{ 39 }
二 尊孔复古与经世致用	{ 53 }
三 黄老之兴与文景之治	{ 61 }
四 藩国文人	{ 69 }
第三章 独尊儒术与积极入世：西汉盛世儒生的心态	{ 82 }
一 西汉盛世的来临与儒学的复兴	{ 82 }
二 董仲舒及儒学独尊地位的建立	{ 88 }
三 五经的传承	{ 94 }
四 从政的儒生	{ 99 }
五 圣人理想与西汉儒生大官的道德	{ 109 }
六 司马迁与《史记》的尊孔心态	{ 121 }
第四章 润色鸿业与忧患意识：西汉盛世文学家的心态	{ 135 }
一 赋的传统与汉赋的繁荣	{ 135 }

二	主文谏诤与忧患意识	[142]
三	《天子游猎之赋》与司马相如	[156]
四	刘向刘歆父子与汉由盛而衰	[169]
第五章	好学复古与宗经征圣：扬雄的心态分析	[179]
一	雅好文学的文人生活方式	[179]
二	《剧秦美新》与扬雄的圣人革命心态	[189]
三	扬雄的思想及其文风	[199]
第六章	仁义之风与忠义之道：东汉官僚文人心态	[209]
一	新朝的灭亡与东汉的建立	[209]
二	倡导儒学及对东汉文人官僚集团的影响	[225]
第七章	实事求是与崇尚名节：东汉文士的心态	[241]
一	东汉辞赋家的心态	[241]
二	东汉文士的气节及学风	[255]
后 记		[279]

序 言

秦汉的历史，自然是从秦统一到汉灭亡为止，年代大约四百余年。然而，秦统一与秦建国是两个概念，其年代相差甚远。而汉灭亡在汉献帝时，此时实际上三国已开始。因此，如果严格地把秦汉文人心态史局限于秦的统一至汉的灭亡，即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虽然在理论上更符合秦汉文人心态史的命题，但却会给写作带来困难，因为一个时代人的心态的变化，很难说是一个突变的行为，而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因此，我们在论述秦朝文人心态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秦统一前秦国的文人，而论述东汉文人心态，又要考虑到从东汉到三国的过渡，对跨越东汉与三国的文人，就要适当地割舍。所以，就时间而言，我们提到的文人，可能超出了秦汉这个时期的严格编年划分，即有些文人在秦统一前就已活跃着，有些文人曾经活跃在东汉，但可能更多活跃在三国。这样的交叉不能算作是体例上的缺憾，而应视为为叙述的方便所采取的不得已手段。

自秦统一至东汉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秦、西楚、西汉、新、东汉五个阶段，我们本来没有理由忽略这五个阶段的变化，而采用“秦汉”这个不准确、不完全的称呼，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选择这个只能涵盖三个阶段的称呼，因为“秦汉”这个称呼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已包容了西楚及新。所以，我们在讨论秦汉文人心态的时候，就不能忘记楚汉战争及新朝的文人。

秦世不文，又加时间短促，其文人的资料短缺，我们确定秦朝文人的时候，主要讨论了作为“博士”的文人以及作为政治家的文人。

“博士”属于大家公认的文人集团，而出身文人的政治家，其文人的身份当然是不可忽略的。

楚汉战争时期的文人，主要是出身于文士的谋略家，他们的主要任务可能不是从事《论语·先进》所谓“文学”活动，但他们把自己所学的“文学”谋略用诸政事，其行为方式接近于战国纵横家，所以，他们仍然是文人。

自西汉之初到东汉之亡，文人的数量不但非常庞大，而且其身份也极其复杂，大致说来，有如下四种：一、读过书的皇帝。除了汉高祖刘邦及几位短命的婴儿皇帝以外，我们相信西汉、新、东汉的皇帝几乎没有不读书的，但西汉的皇帝读书的热情不及东汉的皇帝，东汉的皇帝中，如光武帝、汉明帝，本身就是经学家，所以，我们对这些学问广博，经常从事文学活动的皇帝，应该视作文人之一员。二、从文士起步，最终爬上高级官职的官僚文人。这些文人在做官之前，主要从事学习之事，后来，由于机缘，他们以“明经”或者“经行”出仕，或者在社会动荡中揭竿而起，官大者可至三公，小者亦有令长之职，为父母官，为大将军，封王封侯，其所从事，可能是战阵厮杀，可能是理民治狱，但只要他们受过学，好学，或有师承，创作有文章，亦应归入文人一类。三、学者，主要是经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身份或者可能是博士教授，或者是著书立说者，或有官而小，或无官职，其成就主要在学术方面，他们当然是文人。四、所谓文学家，即创作诗赋之人，他们虽读经书，或也做官，但主要以文学成名，他们也当然属于文人。

就今天的意义而言，“文人”更多指的是从事文学活动，或撰述、研究人文科学的人，但我们在构架秦汉文人心态史的时候，对“文人”的把握标准比较宽泛，这是由于：一、两汉尊重儒生及儒学，儒生大抵皆做官；二、聪明而有条件的两汉人，都会学习文化，即学习六经诸子之学，而以六经为重点；三、两汉时还基本上没有职业文人，文人要生存，或依附于祖业，或寄食于官府，文人中祖业不发达的人多，所以大部分文人都是官僚，而且因为文名的杰出，必然带来官职的尊崇。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外的文人，更不能把文人局限在以文谋生的人群中。

从秦至东汉，文人队伍逐渐发展，文人的数量一代超过一代。秦朝文人经战火洗礼，以及焚书坑儒之祸，暴露在《史记》中的文人少得可怜。西汉之初汉高祖刘邦功臣多无赖流氓，正是文人稀少的原因。及东汉，太学之盛，“好学”成为一个时代人的追求，所以文人的数量空前扩张、在东汉之世，从功臣到官僚，可能要找到不懂经学，不识文断字的人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提到的文人数量上，秦、西汉、东汉是逐渐递增的。

从秦至东汉，文人随着社会的变化，其心态也在不断变化，大体而言，秦时文人，主流是反暴秦及反法家，因此需要恢复传统。楚汉战争的文人首先是要谋求胜利，所以多诡道。汉初文人面临恢复及统一问题，黄老之学为官方思想，而文人结合儒道，追求统一。自武帝至汉亡，西汉空前强盛，儒学独尊及润色鸿业成为主旋律，然儒家主张居安思危，此时的文人通过强调讽谏，流露出了忧患意识。王莽即位前后，由尊孔复古所唤起的“大同”理想占了上风，鼓吹禅让成了潮流。东汉之初，谶纬盛行，其学说大有凌驾经学之势，恢复儒学及六经本来面目，剔除虚妄之谈，便成了实事求是学风兴起的理由。而宦官专权，外戚骄恣，母后称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使东汉王朝常有欲坠之忧，汲取归附王莽的悲剧，因此士人节气受到文人推崇。而在亡国的脚步声里，伴随着文人的失意与痛苦。

由于由秦到汉亡，时间跨度大，地域辽阔，以及人文背景、个人经历方面的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人，其心态肯定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心态也是无限丰富，发展变化的。我们只能把握秦汉这四百年文人心态的大致脉络，而不能曲尽每一位文人复杂的心态，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由秦而汉，文人心态的丰富多样，是这个时代丰富性的体现。秦汉文人忽遇剧变，由战国文人在学术及言论上的无限自由到秦的空前专制，其适应力一时难以转变，必然导致暴秦的残酷镇压。终汉之世，无论是君主还是文人，都试图恢复秦以前重视文人的自由传统的价值观，并自觉地按照孔子所建构的大同及小康标准建设和评价社会进步的成果。由于孔子的主张更多带有理想化特征，在大同及小康时代，也未必如两汉那般精彩，因此，两汉的社会和两汉的文人，都可

4 期待与坠落

以说具有理想化色彩。所以说，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自觉地实践孔子理想的时代，两汉的文人也是最追求圣人人格的文人。这样的特点，理应为汉以后的任何一个时代所仰慕。

第一章 威武不屈与复古心态的萌动： 秦朝文人心态

一 秦的统一及覆亡

(一) 秦的建国与强大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文人的命运，也步入了一个新时代。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的远祖，可以追溯至帝颛顼的后代女修。女修无夫而孕，生大业，这说明女修的时代具有母系社会的特征。大业即皋陶。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帮助禹治水，受到舜嘉奖，并以姚姓玉女妻之。大费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大费即柏翳。舜为大费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名大廉，即鸟俗氏；一名若木，即费氏。若木的玄孙名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商汤御车，在鸣条大败夏桀。大廉玄孙孟戏、中衍在帝太戊时御车。从太戊以下，中衍的子孙有功，为诸侯。中衍的玄孙名中湣，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跑，恶来有力，为殷纣王的猛将。武王伐纣，杀恶来，蜚廉因命外出，归来时纣已亡，遂在霍太山设坛祭纣。蜚廉有子名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即皋狼，受宠

于周成王。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受周缪王的喜欢，曾一日千里归周，使缪王及时平定了徐偃王之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遂为赵氏。恶来有子名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非子蒙造父之宠，居赵城。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周孝王遂使非子居秦，为附庸，续嬴氏祀，称为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周宣王时，秦仲为西戎大夫，为西戎所杀，其子庄公破西戎。庄公死，太子襄公立。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废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出奔申。公元前771年，宜臼的外祖父申侯联合郟、西弗、犬戎攻周，杀幽王及伯服，虜褒姒，西周灭亡。翌年，秦襄公与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邑，小康时代宣告结束，“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开始。也正是这一年，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山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自此，秦开始建国。

秦襄公后，经文公、靖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而至秦穆公。秦穆公于公元前660年即位，公元前621年去世，在位三十九年，为春秋霸主，秦遂为强国，与春秋之晋、楚、齐诸国相伯仲。马非百《秦集史》曰：

秦以西垂小国，乘周之乱，逐戎有岐、丰之地。是时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宪公、武公、德公，以次蚕食，尽收虢、郑遗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于穆公，遂灭梁、芮，筑垒为王城，以塞西来之路。而晋亦灭虢，东西京隔绝。由是据丰、镐故都，蔚为强国，与中夏抗衡矣。总观穆公之力征经营，盖有东进、西进、南进三大政策之分。其始也，致全力于东进政策之推行。及东进受挫于晋，则改而从事于西进。西进既成，又转而南进，而穆公已衰老矣。然秦人异日统一之基，实自穆公建之，此不可不知者也。

作为春秋霸主，秦穆公招贤纳士，为人仁惠慈祥，是春秋之际难得的具雄才大略，同时又仁而有义的君主。《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时孔子三十岁，齐景公与晏婴访问鲁国，齐景公问孔子说：“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回答说：“秦虽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垒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穆公的志大中正，礼贤下士，正是秦国由霸而王的基础。

（二）战国时代的秦国

秦穆公去世后，经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秦国一直保持了强国的地位，哀公三十一年，即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国这样的老牌霸主不堪一击，为新霸主打得粉碎，楚王亡命随，吴军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七日不食，日夜哭泣，哀公命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翌年，先败吴军于沂，灭唐，又败吴军于雍澨，吴军归吴，楚昭王归郢。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惠公立。惠公在位九年，悼公立。悼公在位十五年去世，厉共公立。厉共公元年为公元前476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到来，开始了秦国称霸中国的历史。秦国在小康时代结束以后出现，在春秋之世强大，到了战国时代则不可一世，缘于秦国适应了社会的变迁，紧紧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战国的开始，有两件事的发生是重要标志，一个是田氏篡齐，一个是三家分晋。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

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

战国之与春秋，形势有很大区别。春秋时代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是列强争雄的时代。也就是说，春秋时诸侯在表面上还是“尊王”的，而战国时诸侯则是各立为王。春秋时，除了秦、晋、楚、齐四个超级大国以外，还有成周所分封的一百多个中小诸侯国，

这些大国各自笼络一批中小诸侯，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到了战国时代，经过数百年的风云变化，大国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和周天子的进一步衰落，其中的大部分中小诸侯纷纷被蚕食，而新的大国集团也已经基本上形成。田常于公元前481年杀齐简公，公元前403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公元前386年田和始列为诸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谢世，田和并齐，并自立为齐侯，姜齐绝祀。过了三年，公元前376年，韩文侯、魏武侯、赵敬侯灭晋，三分其地。这些被认为是颠倒伦常、有悖道德的行为，导演者是战国大权在手的王公大臣，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对发生这样严重事件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他不但没有兴兵讨伐，而且还正式承认这几个新诸侯，这也就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共主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他用他的行为，放弃了维护周礼的使命，从而带头破坏了礼制秩序。从此以后，虽然中国还存在成周这个“宗主”，但周天子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沦落到了小诸侯的境地。而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小国，完全变得可有可无。中国的广大区域，实际变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驰骋的疆场，因此便有了“战国七雄”的说法。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这是春秋以来除了楚、吴、越等南蛮以外的诸侯王称王。此后，北方诸侯先后称王，正式脱离了与周王的隶属关系。

战国时代，中国社会风气有了重大变化，汉武帝时严安上书，其中论及西周、春秋与战国的不同，说：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

横，驰车击毂，介冑生虬虱，民无所告塑。^①

刘向《战国策叙》也称：

周室至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敦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

^①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

周王朝由盛世转而至春秋，再至战国，真正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趋于极端混乱无序。而这也正是新一轮整合工程的契机，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秦国正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争得了先机，实行了彻底的变革，而这项变革的领袖是商鞅。

商鞅，又名卫鞅，事魏，秦孝公下令征求奇计以强秦，商鞅从魏国投奔秦国，见秦孝公，受到重用。据《史记·商君列传》载：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是极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但自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之后，秦日渐式微，与中原绝少交通。秦孝公意欲复兴秦国，不欲中原诸侯之轻视，下令征求“奇计”，以求“强秦”。只要能有奇计使秦国富强，不但要给高官，还要分封爵土，使其跻身世袭贵族之列。商鞅听了秦孝公这个命令，西入秦，因景监求见秦孝公，游说孝公变法，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根据《史

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内容，包括整顿户籍、奖励军功、奖励农业生产、开郡县、废井田、统一度量衡等，“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孥”，“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商鞅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其推行法令之手段，也极其严厉。商鞅以左庶长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迁为大良造，“居五年，秦人富强，天下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秦国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的使命，就在于它是最彻底的改革者。虽然秦国统一中国后，很快亡国，但秦国在战国之际适应变革的需要，不惧世人之非议，轻仁义而重法治，却仍然是成功的经验。秦孝公不愿学习帝王之术，而热中于“强国之术”，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这就为将来的亡国埋下了伏笔。连积极推行变法之术的商鞅本人也觉得这种政策不是上上之策。但是，这种有先天缺陷的政策之推行，却使秦国很快成为超级大国。当然，商鞅也以其标新立异，虽受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大臣之反对，但因为秦孝公的任用，因此而获“尊官”、“分土”之赏。

秦孝公变法前后，战国诸列强都在变法。如此前，魏成子、翟璜、李悝、吴起、西门豹等，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以李悝新政最为著名。《汉书·食货志》云：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战国之时，最早推行变革主张的是魏国的李悝。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以使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得到极大的增加；而其平余的思想，既能不因伤民而使民心离散，又可不伤农而使国家富强。在法制方面，李悝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鬻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法经》分正律、杂法、减法三部分。李悝《法经》，体现出对君主集权的维护，盗符、盗宝、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都被视为严重犯罪，不仅本人处死，而且族夷乡亲。并强调在法律面前民众的大致平等。这样的变法主张，对同样曾在魏国生活过的卫鞅有巨大影响。吴起任魏国西河守，及魏文侯死，魏武侯立，被谗逃亡楚国，为楚悼王令尹，推行新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概括吴起的变法内容曰：“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据《韩非子·和氏》载，吴起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吕氏春秋·贵卒》则载吴起建议楚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吴起变革的矛头，直指世袭奴隶主贵族，通过减少爵禄、禄秩、枝官，开垦土地，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

韩昭侯时，申不害为相，在韩国推行变革政策。《史记·韩世家》赞其“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引申不害之言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曰：“申不害言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申不害之变革，其实质也是通过选能授官，严格赏罚，以加强君主集权，增强国家实力。

齐国威王时，有邹忌、淳于髡等人，生活优渥，敷衍齐威王改革政治，重用贤才。淳于髡拾遗补阙，教导邹忌修法律而督奸吏，都可看作是改革措施。燕文公信苏秦，为合纵，及苏秦死，燕王吮受鹿毛